

革命 与 动员

建构“共意”的视角

MANUFACTURING CONSENT

A Study on Revolution and
Mobilization

张孝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革命与动员

建构“共意”的视角

MANUFACTURING CONSENT

A Study on Revolution and
Mobilization

张孝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张孝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97-2069-1

I. ①革…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
党史-研究 IV. ①D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241 号

革命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

著 者 / 张孝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邹小娥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邹沁芸 段其刚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责任印制 / 董 然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

字 数 / 202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069-1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论

政治动员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发起农民运动，激发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在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革命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将党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扩展到广大的乡村角落及农民的心底。但如何动员农民走出村落和家庭生活的常规例行，走出劳作与交往的常规空间，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对农民来说，关系最重大的问题是具体的生计问题，任何动员农民的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农民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J. 米格代尔 (J. Migdal) 就曾明确提出，“农民政治活动的起始点是对外界的信任：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他认为，“农民联合起来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也不奢望在新的政治中心的决策人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相反，他们只是渴望某种进步，以帮助他们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①。许多学者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展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问题的分析与解释。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农民发动起来让他们走出传统后，如何保证他们持久地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对党的革命号召和行动保持一贯的热情与支持？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关键和重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史上，延安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历史

^① [美] J.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 179 页。

时段，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长征结束到建立政权的一个过渡时代。延安则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熔炉。长期以来，“延安道路”成为解释中国政治的重要模式^①，围绕着“延安道路”衍生出一整套话语模式，如延安神话、延安传说、延安经验以及在国内党史研究中最常见的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等，这充分展示了“延安”这一话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无论是普通的百姓，还是孜孜以求的学者，都以某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并延伸着延安的意涵。因而，这一称呼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所表达的时代或地理区位之意。延安的吸引力不仅来自战争年代所产生的神奇力量以及与中国共产革命事业的成功之间的紧密关联，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巨大的历史效应在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中的不断回响与浮现。这种回响不仅包括民间的回忆与诉说，更有来自政权高层对延安精神的有意识强化。“自从1949年以后，中共一直倡导延安精神来强化它的传统以及它同民众的密切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强调延安领导层在政治上的稳定性。结果在中国之外，‘延安道路’也通常被当作描述中国政治的基线，一直到80年代，甚至于90年代。”^②这一判断并非过分，实际上，在当今中国，对延安传统的强调与重视仍不输于当年。2002~2004年，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再出现于革命圣地延安。^③这一访问与到场所凸显的象征意义在于，

① 1971年，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将“延安道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模式。

② [澳]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的政治》，载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第632页。

③ 2002年4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载2002年4月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2004年4月，胡锦涛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载2004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延安的传统仍将被延续，中国仍将坚守共产党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并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可以说，环绕在延安及其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上空的光环依然夺目。我们需要不断地将目光投注在这里，看看这里曾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进而去思考和分析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光环，会受到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瞩目。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中心，从建构共意的角度来展示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政治动员的问题。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提供了展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机制的诸多面相，因而是一个恰当的切入口。换言之，本书将通过对社会教育运动描述性的历史追溯来充分展示党对农民动员所采取的方式和策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虽然我们对共产党所发动的工人、农民运动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但他们是如何将新的思想、观念向人民传播，还缺乏系统的观点。^① 本书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社会教育工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政治动员是如何利用社会教育运动的某些要素，如组织网络资源、思想资源和各种宣传符号的？进一步说，党的精英及其支持者怎样理解和使用社会教育运动？党的教化系统如何与乡村社会的传统习俗和社会文化相磨合，从而进入乡村社会，获得民众认可？第二，对于党所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及提供的新观念、思想和新的意识形态，那些受教育对象，即广大的乡村民众又有怎样的表现？他们在被要求采取集体行动时有怎样的回应？他们如何确立起各自的行为选择，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本书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推进有关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机制研究的深入。

除了导论和结论外，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有关研究进行大致的梳理和概括，提出建构“共意”这一新的理论视角，说明案例选择的理由和主要的资料来源。第

①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48页。

二章主要介绍抗战时期中共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时空背景。包括对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地理历史状况与背景的介绍，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进入陕北及其在陕北的治理情况。并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的社会教育政策与实践，为下文的分析提供背景知识的说明。第三章转入对抗战时期社会教育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情况的实践分析。本书从这一运动开展的阶段、模式及特点、开展形式等角度具体描述了社会教育运动在边区丰富而精彩的实践活动。第四章主要从社会文化结构角度展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机制的分析。在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新的文化主体，塑造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公共空间，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改造及对乡村民众的基本控制和影响力。第五章则主要从社会心理意识的变迁过程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机制。即面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乡村社会所确立的新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边区社会的各个群体呈现出不同的认知态度和内化模式，在党的精英及各级组织者的各种策略和手段的引导下，共产党实现了对边区民众的文化整合和社会改造。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章 革命叙事中的政治动员	1
第一节 研究综述：从现场观察到微观机制分析	1
第二节 建构“共意”：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19
第三节 案例选择依据和资料来源	24
第二章 社会教育运动的时空背景	28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自然与社会政治生态	29
第二节 社会教育运动的历史缘起	48
第三章 社会教育运动在边区的实践与表达	66
第一节 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模式	67
第二节 社会教育运动的原则与策略	78
第三节 社会教育运动的组织形式	87
第四节 社会教育运动的泛化形式	98

第四章 政治动员机制：社会文化结构分析	114
第一节 确立新的文化取向	115
第二节 重塑乡村社会关系网络	129
第三节 构建新型公共空间：生活空间 与政治空间的融合	145
第五章 政治动员机制：社会心理意识分析	164
第一节 新规范的引入：智识启蒙	164
第二节 新规范的引入：身份建构	178
第三节 新规范的内化：不同群体的回应	192
第四节 新规范的内化：三种模式	203
结 论	221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8

第一章

革命叙事中的政治动员

自从埃德加·斯诺 1936 年勇敢地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一刻起，无论国内与境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革命事业的探究与思考就不曾停止过，由此也使这一问题承载了太多的装饰，其真实面目被层层包裹起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观察家、研究者和新闻记者直接进入现场进行朴素描述。20 世纪 50 ~ 70 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延安道路”、“革命的交换理论”等分析模式，此外一些采用比较历史方法的学者也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纳入分析范畴。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减少了对宏大理论范式的依赖，采用了更为微观的解释路径和取向，特别是将革命动员的成效同农村社会史以及农民的心理动机联系起来。鉴于革命研究的前沿理论对意识形态因素的重新纳入，本书主要受社会运动理论中建构论范式的启发，试图将建构“共意”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引入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研究中来。

第一节 研究综述：从现场观察到 微观机制分析

就本书的研究设计而言，主要是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机制问题，即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的一种分析，因此，

笔者将在参考有关学者研究综述的基础上^①，结合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对这一研究状况以时间为线索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概括。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企图将一个领域里复杂多样的研究立场化约为少数取向的做法，都难免失之武断。^②就此而言，本书的研究也只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解释面相。

1949 年以前：亲历者的观察

1936 年，斯诺作为外国记者首度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随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以及他后来的相关论著中，斯诺强调党的社会经济政纲在党与农民关系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均贫富的政纲满足了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的需要。^③1940 年，乔治·泰勒（George E. Taylor）在对华北游击队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为乡村中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领导，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机会。^④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斯坦因（Gunter Stein）、白修德（Theodore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等人

① 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 1920 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在新版的《延安道路》一书“后记”中，他全面考察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解释中国抗战的主要观点，包括同时代人的观察记录，后来的学者对革命、抗战所做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与讨论各有侧重，各持己见，视野所及不仅在中国抗战与革命本身，也将问题延伸到世界革命因素和国际力量影响的框架下来探讨。参见〔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前言，第 6 页。

② 〔意〕Donatella Della Porta、〔英〕Mario Diani：《社会运动概论》，苗延威译，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2，第 4 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夏翠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1983；《中国见闻录》，星光编译社译，香港星光出版社，1941。

④ 参见〔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载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 607～608 页。

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中推行民主和对农民的尊重与保护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最后的胜利。^① 此外，也有学者从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操纵民众的能力方面来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力量。^② 这些曾在中国境内生活过的西方人士，通过他们的参与观察和切身体验，从“客位”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要素作出了分析和解读。尽管他们的立场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却读出一种多元的意味。这就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问题绝不是单一因素下的产物。

20 世纪 40 年代，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国内人士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得以进入边区参观访问，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各自的评判。梁漱溟在 1938 年和 1946 年先后两次造访延安，写有《访问延安》、《再忆初访延安》、《再访延安》等文。在《访问延安》一文中，他直截了当地说，他访问延安的动机在于：一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交换意见。梁的信念是，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会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主张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因而，面对 1938 年国共合作之统一战线，他力主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求得国家进一步统一。^③ 1945 年 7 月，黄炎培、储辅成、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人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回来后，黄炎培写有《延安归来》一

① [美] 哈里逊·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陶岱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美] 白修德、[美] 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第 224 页；鲁登·爱泼斯坦：《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载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刊，1946；[美] 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马飞海、章蟾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② 参见 [美]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后记”，第 274 页。

③ 参见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之《我的努力与反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书，对延安的革命活动和社会改革进行了肯定和赞赏。^① 李公朴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六个月的访问。1940年写就《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一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民众运动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边区团结与进步的景象，高度评价边区是模范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② 国民党人士对边区及根据地的看法各异，往往分歧较大，比如舒湮从全国一致抗战的立场出发，认为“为使全国更广泛的区域走上宪政的道路，对于边区的经验与成就必须加以客观地检讨”，对边区进行了客观报道与分析。^③ 也有许多人基于党派立场，对边区共产党及其政策进行了片面解读，如李昂的《西北散记》、原景信编著的《陕北剪影》、李藜初编著的《陕北印象记》、张文伯的《陕北纪行》和《陕北归来答客问》、崔允常的《陕北轮廓画》等，他们对共产党及边区的看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④

20世纪50~70年代：理论范式下的宏观叙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再次展示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浓厚兴趣。当时西方学者无法取得在中国的材料，他们开始使用台湾调查局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大量档案和文献。他们运用新的材料和方法重提在三四十年代讨论过的话题，使问题进一步走向深入。^⑤ 与前一个时期那些观察家、研究者和新闻记者直接进入现场、进行朴素描述的做法不同，这一时段对中国共产党和

① 参见黄炎培《延安归来》，载黄炎培《八十年来》，文汇出版社，2000。

② 参见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三联书店，1979。

③ 参见舒湮《战斗中的陕北》、《边区实录》，每日译报图书部，1939。

④ 李昂：《西北散记》，胜利出版社四川分社发行，1943；原景信编著《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38；李藜初编著《陕北印象记》，解放出版社印行，1937；张文伯：《陕北纪行》，国民出版社印行，1945；张文伯：《陕北归来答客问》，读者之友社发行；崔允常：《陕北轮廓画》，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39。

⑤ 参见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载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10页。

农民关系的解读有了明显的理论上的提升和概括。比如，美国著名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1962年出版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权力：革命中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农民民族主义”（Peasant 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由日本的侵略、占领和镇压所导致的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胜的关键。因为战争和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动力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群众基础。^① 1971年，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提出了“延安道路”这一模式来解释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原因。他指出，“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做出了极大贡献，在敌后根据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总结性思考和概括。他的研究对60年代流行的对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团结了广泛的社会阶层。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和改革的联合，才使得共产党有能力最终战胜日本并打败以美国为靠山的国民党。^② 塞尔登是在全球视野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他打破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盲目仿效的观点，也打破了把群众的民族主义与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分离的观点。

针对上述研究视角的争论和挑战也出现了。比如，针对“农民民族主义”概念，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概念过于简洁，因而出现了对这种偏重农民民族意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解釋的挑战，比如范力沛根据华北地区各种抵抗力量兴起的不同情形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凡是地方抗战势力都不是自发性组织起来的，

①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 ~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美]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前言”，第3页。

而那种自发性组织起来的势力其初衷并非为了抗战。”^① 卡尔·多列斯（Carl E. Dorris）也正是在批评约翰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指出，约翰逊使用 1938～1941 年间的日本档案，以苏北根据地作为案例研究中的问题。因为这一地区在新四军的管辖内，其干部显然是支持阶级调和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共产党后来才在这些区域中组织其自身的活动。他争辩说，农民民族主义在华北巩固区早期农民运动中几乎就没有反映出来。^② 再如，塞尔登的研究也有其局限。这主要来自对其研究的范围——延安及陕北地区是否具有典型性的质疑。多列斯就认为，塞尔登所讨论的延安和陕北根据地具有阶级暴力和土地革命的长期历史，而这对于党活动的新中心并非具有典型性，延安实际上是在群众运动的爆破性发展的中心之外，对共产党的战时活动而言是边缘性的。^③

在批评约翰逊和塞尔登观点的基础上，多列斯强调了以“群众路线”为表征的群众动员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中的重大作用。在《华北农民的动员和延安共产主义的由来》一文中，他考察了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革命经验。他认为党的民众动员经历了几个显著的阶段。第一阶段党的组织者主要强调军事动员，强调民族意识能够为党的抗战努力获得群众支持提供初始动力。但是这种群众运动并没有在乡村一级扎根。1939 年，党的积极分子开始推行一种新型的民众动员，这种民众动员依赖于政治斗争，以创造一种意识和认同，使其与内在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改革和革命目标相一致。传统精英和基层群众在村庄内的冲突为党推动这种农民激进主义并获得其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 687 页。

② Carl E.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anan Communism",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 1976), p. 699.

③ Carl E.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anan Communism",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 1976), p. 699.

支持提供了机会。在1943年之后，党的领导人将所有这些经验加以综合，将群众路线的形式和风格加以制度化。^①

此外，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一个重要突破，即对社会革命进行的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revolutions）。^② 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两本著作中所运用的结构性视角和比较历史方法。以结构性视角和比较革命的研究方法是摩尔和斯考切波对以往革命研究传统的突出贡献。具体来说，摩尔选择英、法、美、中、日以及印度迈向现代性的路径来进行比较分析。他在宏观历史的框架下将中国革命发展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指示着中国随后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的顶点就是20世纪中叶共产党的胜利。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村缺乏一种内聚力，这有助于共产党能够不断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也有助于共产党摧毁旧的秩序。同时，日本的入侵这一偶然的因素加强了革命形势，共产党执行一条分裂农村以便摧毁旧秩序残余的路线，最终导致一场革命。^③ 作为摩尔的学生，斯考切波则在其“将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研究议程中同样强调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的作用。在她看来，和法国、俄国一样，中国虽然最终发生了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但由于中国农民缺少预先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联合和自主性，在旧政权崩溃后，中国并没有像法、俄两国一样

① Carl E.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8 (Dec., 1976), pp. 697 ~ 719.

② 关于比较革命研究的综述，可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48~151页。

③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杨念群、刘鸿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177~178页。

迅速地发生农民革命，中国的农村革命更为漫长。这样，需要通过建立“根据地”来进行军事征服。^①显然，在她看来，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条件。同时，她也指出，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习惯的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人力物力的。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所领导的红军建设之所以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既使用了游击战术，又通过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进而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而且，红军发展出了一种新型模式，其内容不仅包括行军打仗，也包括动员农民，与他们合作。^②

此外，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一书中也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他以“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来分析农民对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参与机制。在他看来，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具体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米格代尔提出，“通过有选择地提供利益和实施制裁的社会交换方式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网络——该网络能对中国农民中先前的微观经济变革作出反应，而且能依靠民众完成复杂的社会工作。中国革命者不是组织起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的敌人更强大的系统性的体制”^③。诚如译者序中所说，由于米格代尔主要使用来自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178页。

②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04~305页。

③ [美] J.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第196、215页。